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

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

杜晓利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

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

杜晓利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杜晓利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ISBN 978-7-208-07556-6

I. 教... II. 杜... III. 教育科学-研究 IV. 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77020 号

责任编辑 任俊萍
封面装帧 王小阳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

——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

杜晓利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8.5 插页 4 字数 218,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556-6/G·1216

定价 30.00 元

摘 要

按照一般的分类,科学可以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类型。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都有研究重心,并且研究重心在 20 世纪都发生了转移。那么,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都发生转变的大背景之下,兼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性质的教育科学,其研究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其重心肯定也存在着转移。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亟待关注的教育问题,探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发展意义。本书是以美国的一本教育杂志——《哈佛教育评论》为个案,对于自 1931 年到 2000 年发表在《哈佛教育评论》上的文章进行的实证研究。力求从文章主题数量上的变化,揭示出教育研究的重心转移,并探析教育研究重心转移的原因。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为什么选取《哈佛教育评论》为例等问题,在本书的引论部分有具体论述。

通过对《哈佛教育评论》的统计与分析,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可以概括为这样三个方面:

第一,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心转移:由“学科本位”到“问题本位”。以 1960 年为界,之前的教育研究特别注重以教育哲学为基础

的“学科本位”研究；之后的教育研究则越来越体现出“问题本位”的研究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对教育政策的关注。“问题本位”中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在教育领域以内，更多的是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教育研究关注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过来，社会问题的解决也促进了教育研究的成熟与发展。

第二，教育研究范围重心的转移：由“教育内部”到“教育外部”。196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主要关注“教育内部”研究，但是60年代以后的教育研究开始对社会充满了兴趣。教育研究不仅表现出了对社会问题的高度关注，而且也很注重社会的参与，比如政府、家庭和社区对学校教育的干涉与帮助。教育研究的这个发展趋势是与教育研究自身需要和社会需求分不开的。

第三，教育研究目标的重心转移：由“教学客体”到“教学主体”。1970年以前的教育研究关注“物”的层面，注重以教学效率为核心的教育研究。1970年之后的教育研究则突出地表现为对教学的双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全面关注，教育研究体现出越来越多的人文关怀。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主要以上面的分析、研究为基础，谈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教育研究要关注教学主体研究；其二，教育研究要关注社会问题；其三，教育研究要注重利用社会资源。需要指出的是，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需要以我国的文化传统为本。只有放眼世界，博采众长，并结合我国实际，才能找到最切合我国教育研究发展的模式。

教育问题的研究必须关注两个维度，即现实维度与未来维度。教育研究的重心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它在未来还会不断地发生转移。未来教育研究的重心又会是什么？需要我们给予密切的关注。

序 一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命题。关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分析和思考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对于加强教育研究自身的建设,提高教育理论研究的自觉性,有着重要的意义。杜晓利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书稿《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以〈哈佛教育评论〉为例》,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探讨了这一问题。这是一次富有创新性的尝试。

20 世纪的教育研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转变,如何捕捉教育研究发生转变所留下的痕迹?作者以《哈佛教育评论》为分析对象,通过考察其自创刊以来发表的论文情况,证明了教育研究在价值取向、研究范围、研究目标三个层面发生的变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不是采取简单统计获取结论,而是运用分阶段的动态统计法显示出变化的状况与结果,比较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教育研究重心变化的趋向。本书揭示的教育研究重心转移的三个趋势:由“学科本位”转向“问题本位”;由“教育内部”转向“教育外部”;由“教育客体”转向“教育主体”,具有新意,反映出作者对问题研究的独到见解,可以引起人们很多的思考,有益于教育研究的深化。

袁振国

序 二

最早看到这本专著的研究设想是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青年课题(课题批准号 2002EJY001)的评审会上。上海市宣传部组织的青年课题主要是用于资助在读博士生论文的撰写。本研究也是其中之一。当时我对作者拟选取《哈佛教育评论》为案例,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教育研究转向问题的设想很感兴趣。作者对这项研究做了详细的前期准备,如果作者能最终完成这一科研设想,无疑对推动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起到积极作用。所以当时的匿名评审我投了赞成票。一年以后,参加华东师范大学 2003 届的博士论文答辩,我欣喜地看到了这一研究成果,也认识了完成这项研究的杜晓利博士。

作为杜晓利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我认为作者选择美国极负盛名的教育研究期刊《哈佛教育评论》为案例,采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对 1931 年到 2000 年发表的 1 655 篇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从数量角度归纳提炼了教育重心转移的几个方面,视角独特,方法科学得当。作者的研究不仅资料翔实,筛选得当,跨度长达 70 年,而且对各时代的社会和教育发展背景、价值取向、研究主题和目标等层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出的研究重心转移具有较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本著作的完成显示出作者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和较好的外语

水平。

参考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各位老师的建议,又经过两年的积累和思考,杜晓利同志对其论文进行了细致的修改,并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的出版资助。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著作就是杜晓利同志对其博士论文修改后的最终成果。

作为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智力开发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近年来,杜晓利同志承担并完成了多项课题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增强了她独立从事教育科研工作的能力。祝愿她凭着自己对教育科学研究的无限热忱,在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阔。

张民选

目 录

摘要	1
序一	3
序二	5
第一章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	1
第二章 案例的选择与研究方法、思路	19
第三章 教育研究价值取向的重心转移：由“学科本位”到 “问题本位”	42
第四章 教育研究范围的重心转移：由“教育内部”到 “教育外部”	94
第五章 教育研究目标的重心转移：由“教学客体”到 “教学主体”	121
第六章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对我国教育研究的启示	149
结语	169
附录	171
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81

第一章

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

在这一部分,作者主要从大科学研究背景下的教育研究、教育研究有中心吗、教育研究重心转移的重要意义三个方面,探讨教育研究重心的转移及其价值。

科学正主宰着 20 世纪,它像希腊神话中的擎天巨人阿特拉斯那样,把整个世界背负在自己的双肩^[1]。所有学科的变化都被置于科学的大背景之下。教育研究也不例外。因为教育的问题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故探讨教育研究的转向问题不能只是囿于教育理论自身,必须基于大学科研究的背景之下。

一、大科学研究转向的启示

追溯科学的历史,我们发现科学的认识有一个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人们只拥有一些粗浅的制造工具的技术。这一时期还没有产生以科学研究为职业的科学工作者,认识的主体主要是各行各业的工匠。这些工匠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并通过与他人之间的交流形成了一些初步的科学知识^[2]。但这些初步的科

学知识还不能被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根据记载,在科学史上,作为职业科学家的出现是很晚的,大约是在十五六世纪以后的事情了。早期的科学大都是有财有闲者或那些较旧职业里小康分子兼顾的或余闲的事业^[3]。所以科学家局限在占社会少数的贵族圈子里,成为了上层或中层阶级的专利。就拿16和17世纪来讲,那时全世界的科学家少得可怜,几乎可以数得过来,如哥白尼、伽利略等。

这一时期的科学研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科学家大都是有经济实力的“富人”。据记载,在17世纪的英国皇家学会中,除了胡克等极少数人外,大多数是贵族、富商,根本不愁生活来源^[4];第二,科学的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在科学的早期,科学仪器和日常生活用具无特别显著的区别,科学的方法和生活中的方法也没有很大的差异,个人完全可以制造仪器装备。因此当时的科学活动是人类社会活动中并不特殊的一部分;第三,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自己喜欢做的题目^[5]。因为没有科研资金的后顾之忧,他们的研究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研究兴趣,做自己喜欢的课题。由于这些限制,这个时期的科学研究被局限于占社会少数的贵族圈子里,从事科学的人和机构都是很少的。而且这一时期的社会建制也是处于一种萌芽式的自由粒子状态,科学家只是各自分散在自己的实验室或书房中,摸索一些微小的研究题目。即使是那时出现的科学组织,如学会、无形学院等科学社团,他们的社会活动方式也是松散的,自由的。因此,历史上也把这个时期的这种研究叫做“自由研究”。

我们所说的小科学,就是指近代科学史上传统的那种以天然和自然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增加人类的知识为主要目的,以个人自由研究为主要方式的科学。它的研究目的不是把科学的知识应用到生产上来改造世界,而是为了认识自然的奥秘。也就是说,科学没有它的

实用价值,只有认识自然的任务。这一时期的科学传统是“清高”的,是“为科学而科学”^[6]。我们翻翻学会的历史就会发现,那个时期人们所得到的成果,除了在皇家学会备案注册外,是没有分文酬劳的^[7]。

随着科学的发展,经过 18、19 两个世纪漫长的历史,科学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个时期要再进行像小科学时代的自由研究已经不可能了。

其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科研难度的增大。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认识的进步,科学研究水平不断提高,这也使进行科学研究的难度不断增大。随着科研难度的增加,所谓“自由”的科学研究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了。

其次,科学研究对仪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也阻碍着科学研究的“自由”。在科学的初期,科学工具很简单,科学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制造简陋的仪器。但到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随着科学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科学工具渐渐从日常生活用具中脱离出来,开始有了特殊要求的、需要专门的仪器设备,而且科学也开始有了自己的独特的、专门的方法和手段。

再次,资金的问题。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随着资本关系的发展,社会上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科学家清高了,不愿把高贵的科研成果,投入资本家的炼金炉;另一方面,这些清高的科学家又苦于清贫,不能进行“自由”研究^[8]。于是,他们又不得不求助于资本家,这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据科学史记载,在整个 19 世纪,科学研究工作和科学教育事业都没有得到社会真正广泛的支持。大部分的科研工作,仍然只是在皇家科普协会或富有的私人实验室里悄悄地进行,大多数科学家还是两手空空的“乞讨者”,“像一个可怜的寡妇一样,在贝尔的办公室里把腰弯到九十度。”^[9]

第四,研究课题的跨学科方式。在牛顿那个时代,要研究一个课题,只需把物理学和天文学结合起来就可以了。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两门学科简单结合就能解决问题的方式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近代,要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要涉及多学科的知识。这样的科学研究根本谈不上皇家学会时期的“自由研究”。

最后一个阻止科学的“自由研究”的因素是信息。随着历史的发展,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科研人员要从事一项研究,需要参考浩如烟海的知识信息,而收集和查阅资料的工作往往超出他个人的能力。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科学规模增大,科学社会功能增强,个人再也无法进行系统的科学活动了,于是形成了科学史上的一个新时期,就是由“小科学”到“大科学”发展的长达 200 年的过渡时期——恩主制时期。科学家不得不向资本家乞求经费,寻找自己的后台,这就是所谓的“恩主制”。“恩主制”的形式较多,典型的就是科学基金会。“恩主制”使科学家失去“自由研究”,被迫接受资本家的意志。用形象语言表述,就是当科学家还在清高的时候,资本的触角已经轻轻地搭在他们的肩上。他们的劳动,在观念上是当作资本的总计划,在实践上是当作资本家的权威,当作他人的意志……而同他们对立的。^[10]这样一来,所谓“自由研究”就变为定向研究,而这一研究,要受到资本家利益的影响或受到资助他们的财团利益的影响,甚至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宗教的影响。

当历史迈入 20 世纪,科学研究就进入了“大科学”时期。这个时期的科研课题相比皇家学会时期的课题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 世纪以后的课题,常常是一些综合性很强的课题,需要庞大的实验设备和复杂的技术程序,要求集合多学科的知识共同协作完成。而且由于知识和信息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形态发展的功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11]。

大科学(Big Science)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家温伯格提出来的。1961年,温伯格在美国著名杂志《科学》上发表文章说,当代科学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小科学变成了大科学。1963年美国科学家普赖斯指出:由于现代科学的规模是如此之大,社会对科学的投入是如此之巨,以致我们不能不用“大科学”一词来称呼它。大科学是相对于小科学而言的。在小科学时代,科学和技术往往是分离的。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认识自然增进知识;而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目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知识的应用与开发。

有人这样评价科学,“20 世纪的科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科学,是愈来愈高度社会化的科学”^[12]。表现为科学技术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变得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的应用性得到不断的加强。^[13]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各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相互渗透,一系列边缘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的涌现也加强了各门学科之间的联系。现代科学改变了过去那种零散分割的状态,正在形成一个门类繁多、层次分明、结构复杂、有机综合的、越来越整体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大科学还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交叉科学、横断科学、综合科学等各种科学的汇流和综合,是以统一的方式把相关科学组织起来加以科学管理的系统。^[14]科学上的这个趋势早在美国学者 J. 希夫勒所著的《二十世纪科学史话》中就有所预测:

今后在科学上的重大贡献将不是由个人,而是由有组织的科学家小组来作出。换句话说,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们将组成一个一个小队,把各组成员的知识汇集在一起,来攻克某些重要问题。^[15]

马克思曾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句话或许更深刻、更敏锐地揭示了这一转变的内在本质。这句话也强调了这样一个道理，就是不能只停留在对事物的认识上，而是要关注实际问题，要力图改造现实。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如此，必须关注社会实际。生产的实际需要为科学研究提出问题、指明了方向，还为科学探索提供了雄厚的资金准备，为科学技术的腾飞提供了条件。

可以说，社会的需要是科学发展的生命力所在。恩格斯曾做过这样形象的比喻，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6]。比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就能够看出社会实际需要是如何推进科学研究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爱迪生为咨询室的首脑。他的传记作者M. 约瑟夫森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爱迪生决定，找一位物理学家参加咨询室的工作，因为也许需要有一个来处理数学和统计方面的问题（假如产生了这些问题的话）；但是海军中没有物理学家的编制，所以他们聘请的人只好用化学家的名义来支薪。

由此可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要集合多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解决战争中的某个具体问题。但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情况就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17]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曼哈顿计划”与其他科学研究相比，其不同在于：它不缺资金，几十亿美元的拨款顺利到位；它也不乏人才，大批著名的科学家投身

于此,其中仅先后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就有近 10 位;它显然也不同于传统的大学实验室的工作模式……但是,它与其他科学研究的不同在于它的目标:它不是为了发现和研究自然现象,或是去验证科学定律,而是基于战争的需要,为了发明一种新的威力巨大的战略武器,为了与纳粹德国抢夺战争中的主动权,早日结束这场血腥的战争。仅仅三年时间,原子弹就在广岛和长崎上空炸响^[18]。可以说,“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开辟了大科学的时代,它的成功是科学、技术、经济、社会高度协同的产物,它的成功诠释了大科学的内涵,第一次显示了大科学的浩大规模和社会化协作的特点。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对人类最大的启示在于,使人们认识到广泛动员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并集中在某些特定的目标上,就可以产生科学与技术的突破。也就是说,要以核心问题为纽带,充分发挥多方面科学家的聪明才智进行科技攻关,就可以带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曼哈顿计划”的成功,以后的卫星上天、阿波罗登月、宇宙飞船和航天飞机的制造、计算机的发明等,所有这些不仅变革了传统的纯粹科学的概念,模糊了学科之间和科技之间的区别,甚至突破了地域和国别的界限,重塑着当今科学的新形象。

那么,这些核心问题是如何产生的呢?显然原子弹的发明不是基于科学技术知识自身的需要,计算机的产生也不是基于物理和电子等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而是基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因此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重视社会的需求是科学发展的重要动力。反观 20 世纪美国的科学研究,它之所以成功,之所以特别有效率,很值得重视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放弃了英国式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化的研究线路,采取了现实需要→理论研究→实际应用研究的研究线路。^[19]

由此可见,在科学领域,重视社会的实际需要,利用核心问题带

动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当前科学研究的重要特点。

以科学技术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那么,自然科学背景下的社会科学的情形怎样呢?

社会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发展人类自身的一种强大手段。每当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就显得特别活跃。^[20]与自然科学的研究趋势相类似,20 世纪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呈现出了以核心问题来带动研究的趋势。为此当代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性研究空前加强,由偏重理论研究逐步转向以研究解决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为主,从而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影响。因为社会科学作为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知识体系,只有把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重点,才具有生命力。在这方面,尤以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最为活跃。

我们反观 20 世纪社会科学出现的一些新的分支学科,就会发现,他们的产生和发展大都是基于社会需要,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

拿社会学来讲,自 20 世纪以来,社会学研究就很注重运用社会的观点和方法,了解分析研究社会实际生活现象,以解决社会生活问题。当某种事情被广泛认为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社会问题的时候,这种事情就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特别是在美国社会学中,新的学科分支是在对新的一组问题做出的反应之中产生的。几代人之前,大量移民的涌入唤起了人们对同化与文化适应过程的极大的社会学兴趣,正如黑人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变化强化了种族关系的专门研究。同样,一些更加显著的城市生活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们的强烈注意,在一段时间,他们的研究地点一般是城市贫民区,主要来观察少年犯罪、成人犯罪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异常行为。^[21]工业社会学